

谈所谓萧(友梅)黄(自)矛盾的问题

廖辅叔

近年来常有人问我提起萧友梅和黄自矛盾的问题,我总以为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而且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认为没有多谈下去的必要。但事情还是继续传下去,而且越传越走样,有的说,黄自有野心,有的说,黄自提的教学改革的意见,萧友梅拒不接纳,所以黄自愤而辞教务主任之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连外国人也远道来信询问,恐怕还是要说个清楚才好。

据我所知,这两种说法都近于言过其实。黄自是谦谦君子,对萧友梅是毕恭毕敬的,写信署名总是“后学黄自鞠躬”,说他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甚至会背后捅他一刀,我以为是近于捕风捉影。萧友梅接任音专校长的时候,一直为教务主任的人选发愁,他

最先想到青主,后来一听到黄自返国,立刻不考虑同青主老朋友的关系转而登门敦聘黄自来校任职。当时黄自还只有二十五岁,这是打破论资排辈,破格用人的壮举。后来音专的教学设施,萧友梅并没有照搬德国的一套,而是博采众长,而且主要还是参照英美音乐教育的有益经验,这方面黄自的贡献是主要的,萧友梅对黄自正倚重之不暇,哪里还会拒不接纳他的意见呢?但是既然提出了矛盾的问题,正所谓空穴来风,总会有些凭据的,不过这些传闻,与其说是发生在萧黄本人身上,还不如说是别人引起来的,就说一点来龙去脉吧。

萧友梅欢迎独身职工住在学校宿舍里,学校入夜比较不那么荒凉,当时韦瀚章,黄自都还没有结婚,同住一个宿舍,相处得很是融洽,后来黄自结婚,自己组织了一个小家

庭。可是应尚能又搬进来了,因为他也还是单身汉。他们两位也相处得非常融洽。黄、应、韦三人因此得了“三剑客”的美称。他们什么事情都力求取得一致,这里说一件有趣的小事。黄自的外文拼音是Huang,应尚能的外文拼音拼作Ing,当时俄罗斯籍教师很多,他们有一种特性,叫人的时候总要把结尾的辅音“g”叫出来,所以黄自被叫作“黄格”,应尚能被叫作“应格”,韦瀚章的韦字没有尾音的,却也要叫作“韦格”以示一致,但一致之中却又有不一致的地方。黄自是教务主任,应尚能是教授,韦瀚章却只是一个“注册”,那是普通的办事员。这未免相形见绌,有一次工作总结,黄自就提出增设注册主任的建议,这一提给音专的那个会计知道了,立刻跑到萧友梅那里去,说会计也应该升格为会计主任,萧友梅当即表

示,什么也不能升为主任。要是提升,学校的组织机构就要膨胀起来,学校的经费负担不起,萧友梅认为,黄自不会不知道升格主任是行不通的,他这种做法是我们现在称为“矛盾上交”的手段自己做一个人情,把别人的愿望转嫁到萧友梅头上。

中国有一句老话:“文人相轻”,民间的说法则是“同行如敌国”。音专的规模虽然不大,教师之间也还是“未能免俗”。音专的声乐组主任是周淑安,应尚能是专任教员。他们两位都开过个人的独唱音乐会,群众的反映是应尚能的比较成功。音专每年总要举行几次公开的音乐会,应尚能每一次都有独唱节目,周淑安没有,但是她指挥的合唱还是相当成功的。1928 年她指挥的合唱团参加上海外侨组织的纪念舒柏特逝世一百周年声乐比赛,赛倒了当时的德法等外侨,获得一等奖,所以她还是高自位置的。周、应之间如何闹矛盾我不清楚,只是听到一些闲话,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周淑安的丈夫胡宣明帮周淑安译过一些舒柏特作品的歌词,韦瀚章就拿他的译文作为取笑的材料。“九·一八”之后胡宣明面对日本的侵略也写了一些抗敌救国的歌词,由周淑安谱曲作为声乐教材,也作为音乐会的节目演出过。有一次胡宣明来学校,恰巧见到一些外籍教师,黄自给他们介绍,除了

胡宣明的身份之外,还说他是一个 poet(诗人),这更让韦瀚章拿作笑料。另一方面,我也从周淑安的学生那边听到他们谈论应尚能、韦瀚章和他们那个男佣人的生活,说得非常难听。到了周淑安的一些学生拒绝上周淑安的课,闹到周淑安提出辞职,矛盾就表面化了。

据说有一天应尚能的学生蔡绍序把周淑安班上几个保送生召集到一起,说他们跟周淑安上课学不到什么东西,并说克里洛娃是怎样怎样好,教他们不要到周淑安班上去上课。那些学生真的就听他的话不到周淑安班上去。周淑安急了,走去告诉萧友梅,萧友梅找到不上课的一个学生,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说他们新来乍到,不要轻举妄动,他们是保送学生,弄得不好就要送回去的,那个学生刚从内地到上海来,没有什么经验,就老老实实地把事情的经过“坦白”出来了,并表示愿意回去上课。事情就算解决了,萧友梅认为这不会是学生的自发行为,提出克里洛娃只是转移视线的手法,这件事应尚能有一定责任,黄自身为教务主任,又是应尚能的老同学,他本来可以利用他对应尚能的关系劝阻应尚能不要走得太远,这也是对学校不够负责的表现,但这些都是闷在心里的,大家都没有当面争论过,只是以萧友梅的名义对学校教职员发了一封公开信,说学

校最近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希望大家以学校事业为重,“和衷共济,不要制造混乱。否则此倾彼轧,无有已时,而学校之前途将不堪问矣”。只有周淑安自感切肤之痛,又想到“三剑客”的连锁反应,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写历史交代材料,还说是黄自有野心。至于黄自这方面呢,因为他与应尚能的特殊关系,处境比较尴尬。本来他长期以来都感到担任教务主任一职,影响他的创作和著述,他的《长恨歌》还差三章没有完成。他还计划写一部音乐史,还想根据他多年的教学经验,编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和声学,所以早就请萧友梅另简贤能接替他的职务,萧友梅则因为找不到适当人选,一直没有同意,现在黄自为了表明自己不是一个贪图名位的人,坚决要求辞去教务主任一职,萧友梅深感无可挽回,于是想到那位与马思聪共创广州音乐院、远在广州素未谋面的陈洪,陈洪则深感意外,答应先来试一试,结果他来的第二天就因日本侵略军又把战火烧到上海,帮同萧友梅应付音专从江湾向租界的大搬家,自此与萧友梅共同维护风雨飘摇的音专,成为一个善始善终的得力助手,这是后话不表。

现在还是回到黄自的所谓野心问题,这是应该弄明白的,我为此曾同黄自的得意门生、在下的知心好友江定仙谈过,他也认为黄自不会有这种

野心。就他的品格论，他不是这种见利忘义的小人，而且就事论事，他当时才三十多岁，萧友梅已经五十出头，当时五十岁已经算是进入衰年，萧友梅又体弱多病，黄自是萧友梅的天然的接班人，他何必急不可耐地干抢班夺权的事呢，黄自死在萧友梅之前两年半，这是万万没有料到的。假如黄自不死，萧亡黄继，也许音专不会那么轻易落入汪伪政权的魔掌。黄自的天亡不仅是黄家的不幸，更是音专的不幸！

说到这里，所谓萧黄矛盾的问题已经可以找到答案了，所谓矛盾，其实不是他们两人之间的问题，更多的倒是别人造成的，关于这方面还可以谈一谈。

说到音专举足轻重的人物，萧友梅之外，首推黄自，谁有什么要求，在萧友梅那里得不到满足，就会找黄自去发牢骚，希望黄自帮一把，黄自生性随和，为了安抚来人，总是好言相劝，在来人说到萧友梅的什么短处的时候，他有时也不免要附和几句。同是一件事，可以有种种说法，例如萧友梅穿的西服是后背开叉的，当时时兴的却是整幅的。对于这件事，可以说他俭朴，也可以说他寒伧，说他吝啬，甚至发挥到说他贪小便宜，完全看你用在什么情况上。前面说的来人先是向黄自发牢骚，黄自附和了他几句，后来萧友梅在

本单位或是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在外单位满足了那个人的要求，他这就转过来觉得还是老萧有办法，黄自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于是又回过头来讨好萧友梅，把黄自附和他发牢骚的、对萧友梅颇为不敬的话或在他家里听到的不利于萧友梅的话向萧友梅报告了，而且还加以渲染。举例来说，黄自家有一个姓胡的客人自言善观气色，会看相，看得相当准，相当灵验，随即说某某人如何如何，某某人如何如何，听的人也点头说好，黄自的夫人汪颐年听得入神了，想起萧友梅常常闹病，年纪也不小，因此问胡某人对萧先生的寿命有什么估计。这番话后来传至萧友梅那里却变成是：汪颐年问胡某人，问你什么时候死。这就变成了搬弄是非了。我因此想起，有些传说是越传越走样，越离谱，使人不敢相信。

萧友梅有 *staccato* 的雅号，雅号的实例有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音专学生因为开学了交不起学费，跑去请萧校长让他先上课，补交费，萧先生不答应，说：“那你明年再来吧！”（一说是下学期，我是听别人说的，我没有听过萧说这句话。）这个故事传到后来却发展成为“没有钱念什么书，退学”。这种口吻恐怕旧社会的学店老板也不会说出来的。事实上学生没有钱，萧校长倒

是曾经让他抄乐谱挣点生活费。前有冼星海、陈振铎，后有陈田鹤、张昊，都有相当时间是抄谱的。小提琴学生张_{子舍}之还长期承担清洁工作，即我们口头上惯说的“打扫卫生”的工作，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

关于萧黄矛盾的问题，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样子。当然，事情不止这几件，不过性质都差不多，就不必一一罗列，浪费读者的时间了。也许读者看了会觉得刺激性不够强吧，其所以不够强，正因为他们之间本来就不曾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四年前我听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友说，有一次他们去南京查阅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档案，发现萧友梅的一份呈文，那是一九二八年五月黄自逝世之后萧友梅写给教育部的。呈文历述黄自对音专的贡献，请求教育部准将黄自的薪水继续发给黄自的家属，直到聘书期满为止。他们看过之后，觉得这件呈文说明萧友梅对黄自始终是非常倚重的，对黄自的感情是始终不渝的。外间所传他们矛盾的种种说法看来是言过其实的，我同意这种论断，我因此想起武者小路实笃的诗句，即借以结束拙文：

一棵大树，
要全面的去看他，
别去单找那虫蛀的叶！